

康鑫 等 \ 编著

共和国第一代 “父母官”



中国工人出版社

共和国第一代 “父母官”

康鑫 等 \ 编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和国第一代“父母官”/康鑫等编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11

ISBN 7—5008—1811—4

I. 共… II. 康… III. 革命干部一生平事迹—中国—当代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9650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三河市燕郊汇源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1996 年 4 月第一版
199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450 千
印 张: 17
印 数: 1~3060 册
定 价: 21.80 元

目 录

| | |
|-----------------------|-------|
| 了不断的北京缘——刘仁..... | (1) |
| 无悔的功臣——吴晗 | (15) |
| 天津复兴功臣——黄敬 | (27) |
| “别忘了我们老百姓”——程子华 | (40) |
| “六亲不认”的书记——赖若愚 | (47) |
| 燕赵俊杰——杨秀峰 | (52) |
| 心系大众——林铁 | (63) |
| 草原雄鹰——乌兰夫 | (70) |
| 传奇将军新传奇——陈赓 | (85) |
| “好同志”——阎红彦 | (91) |
| “不近人情”的省长——李大章..... | (101) |
| 群众的知心人——李井泉..... | (110) |
| “不简单”的省委书记——苏振华..... | (118) |
| “我要征服贫穷和落后”——杨勇 | (129) |
| 西藏人民的“长工”——张国华..... | (141) |
| 高原春天的信使——廖汉生..... | (156) |

| | |
|-----------------|-------|
| “凡人”的传奇——杨静仁 | (170) |
| 任人民省长的前国民党将领 | |
| ——邓宝珊 | (180) |
| 从军阀到人民副省长——马鸿宾 | (190) |
| 生活在人民中间——潘自力 | (196) |
| 什么时候都要关心大多数人 | |
| ——张德生 | (203) |
| 奉献戈壁滩——王震 | (209) |
| 维族人民的骄子——包尔汉 | (220) |
| 上海滩新传奇——陈毅 | (232) |
| 爱憎分明的上海市长——曹荻秋 | (251) |
| 短暂的辉煌——潘汉年 | (263) |
| 东南“守门人”——叶飞 | (280) |
| 发达省份的奠基人——惠浴宇 | (292) |
| “周呆子”——周一峰 | (299) |
| “责任田”的尝试者——曾希圣 | (305) |
| “红军书法家”——舒同 | (316) |
| “不愿打肿脸充胖子”——谭启龙 | (327) |
| 改造国民党“模范省”的省委书记 | |
| ——谭震林 | (340) |
| “学者省长”——周建人 | (357) |
| 青松耸千山——车向忱 | (372) |

| | |
|----------------------------|-------|
| 魂系长白山——刘锡五 | (383) |
| 兴安岭作证——李范五 | (398) |
| 磊落一生——欧阳钦 | (405) |
| 勇于面对错误——吴芝圃 | (415) |
| 一片丹心在中州——张玺 | (422) |
| 雷厉风行,心系故土——李先念 | (432) |
| 人民公仆——张体学 | (440) |
| 承载几千万人的大船——周小舟 | (447) |
| 情系岳麓山——程潜 | (459) |
| 红土地上的领头人——陈正人 | (467) |
| 庐山的主人——杨尚奎 | (475) |
| 修身齐家治广东——陶铸 | (487) |
| “能源省长”——陈郁 | (498) |
| 马下主桂——张云逸 | (509) |
| “香色平凡不入时,终年绿叶护疏枝” ——李任仁 | (525) |
| 后记 | (538) |

了不断的北京缘——刘仁

作为中共杰出的地下工作者，他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转入“地上”之后，他又为建设新北京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他默默地自语：“要让孩子们永浴阳光！”

1948年10月，蒋介石到北平，策划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西柏坡。

几乎是蒋介石制订出作战计划的同时，红色电波冲破夜空，这份计划一字不漏地送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手中。

新华社第二天即公开揭露了敌人的阴谋。蒋介石长叹一声：中共地下党真是无孔不入。偷袭的国民党军在望都地区遭迎头痛击，溃入保定。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攻克天津。北平守敌进退维谷，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最高长官傅作义将军焦头烂额，是战是和，举棋不定。

机不可失！北平地下党加紧了策反工作。

历史总会上演戏剧性的瞬间。傅作义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家中正“藏”着一个他非常熟悉的共产党——他的掌上明珠傅冬菊。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的强大压力与北平地下党的深入细

致的工作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千年古都幸免于战火！

人民忘不了那些战斗在敌人眼皮底下的地下英雄。本文所写的主人公，正是这样的革命功臣，他就是曾担任过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

刘仁，四川简阳人，本姓段，在其舅父赵世炎的影响下，16岁即投身革命，1927年入党，长期在城市开展党的工作，功勋卓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定都北京。

1955年8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一届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刘仁为市委第二书记，协助第一书记彭真处理北京市各项日常工作。

北京市“文革”前的17年，是刘仁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17年，是工农业生产的各项建设事业高度发展的17年，是社会秩序越来越好、人民安居乐业的17年。

北京的黎明充满了勃勃生机和希望。

刘仁凝视着窗外的一轮初升的红日，心潮澎湃。

太阳下，有一群孩子在欢笑，在起舞……

他的眼睛有些潮了，他默默地说：“要让孩子们永浴阳光！”

彭真哈哈大笑：“你‘地上’
工作也蛮有见地的嘛！”

天安门广场，神圣而庄严，是世界上最宽阔、最美丽的城市广场。

1958年8月底到9月初，邓小平总书记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为迎接国庆十周年修建十大建筑，并扩建天安门广场。

在北京音乐厅千人聚会上，中央领导同志兴奋地说：“中央已经批准了建设新北京的巨大工程，希望大家群策群力，踊跃参加国庆工程的设计竞赛。我对大家的智慧充满信心！”

刘仁随后主持市委会议，初步审查规划和设计方案，选择其中

最优秀的，报送周恩来总理。会后，他和彭真单独商议有关事宜。他说：“老彭，我的意见是人民大会堂要体现中国建筑的传统风格，中间开间大，愈向两侧开间愈小。这样走进这幢建筑的人，一眼就可看清正门的位置，免得进了门廊又碰壁，还找不到正门。”

彭真拍了拍手：“同意！没想到咱们的地下工作者真是个全才，‘地上’工作也蛮有见地的嘛！”

刘仁笑了笑，接着原来的话题说：“有的专家跟我说，人民大会堂中间开间加大后不好看，好像一个人缺了门牙，建议把中央开间改小，我不太同意，你看呢？”

彭真从口袋里掏了两支烟，递给刘仁一支，点上火，猛吸了两口，略为沉思了一会，肯定地说：“就按你说的去做吧。”

刘仁对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设计也提出了看法：“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面向天安门广场的正门，避开纪念碑的东西轴线。这样从大会堂看博物馆或从博物馆看大会堂，都不会被纪念碑遮挡，同时，交通线也更顺畅。”

彭真点了点头：“这个意见和我想到一块，老刘，我觉得人民大会堂南北两端长度应当加长，这样更显得建筑形体庄严凝重。由于加长而增加的六间大房，正好布置成厨房和小宴会厅。此外，人民大会堂北端和中山公园红墙间的距离不能少于 180 米，既能给人流、车流提供场地，也避免高大的会堂给建筑体量较小的天安门城楼造成一种受压抑的感觉。”

刘仁听罢不禁乐了：“老彭，你刚才的一席话可不像市委书记讲的，倒有些像昨天和我一起搞模型的建筑专家说出来的。这样吧，我把我们俩的想法整理一下，报请周总理，你看怎么样？”

彭真脱口而出：“没说的！”

1959 年 10 月 1 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人们又一次聚集在天安门广场。

变了样的天安门广场使人们欣喜不已，他们环顾四周，感受着作为首都人的荣耀。从此，天安门广场成为北京市游人最多的景点

之一。

即使到高楼林立的今天，即便你到过各国众多著名的城市广场，只要你伫立在天安门城楼，俯看天安门广场，你仍然会激动不已，赞叹不已：这是一个多么神奇而美丽的地方！

一夜白头

一滴水珠同样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刘仁心系首都，心系劳苦大众，点点滴滴，功垂后人。

北京解放前工业底子薄弱，连大头针、图钉、汽门芯、玻璃杯、牙膏之类的日常用品也不能生产。几个稍大一点的工厂都气息奄奄，工人住房、看病、养老的条件很差。

刘仁彻夜难眠。

他的脑际总是浮现着不久前他在石景山钢厂、石景山电厂等地视察时看到的情景：不少工人一家几口住在涵洞或窝棚里，门口只挂着一块破帘子挡风遮雨。

他从床上翻身起来，给市里管工业的负责人打了个电话，让他们到现场去看看：“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不知道你们看了后晚上睡不睡得香？”他有些激动，声音也大起来，“这个问题一定要限期解决，要派干部和工人同吃同住，直到问题解决。”

不久，广宁坟、金顶街、白纸坊等一批工人宿舍区抢建出来。

在酒仙桥工业区的建设中，刘仁问主管公交的负责人：“哪一种公共交通工具最好？”回答说：“无轨电车行走快、走得稳、噪音小。可是投资大、票价低不了。”

刘仁当即表示：“最好的交通工具应该用在工人多的路线上。至于票价，你们应该想法降低成本。”

1961年，京西矿务局大台矿发生冒顶事件，40多名矿工被困井下。

刘仁三天三夜守在电话机旁，一边迅速组织抢救，一边 12 小

时不间断地向市委汇报抢救进度。奇迹发生了。抢救人员由上而下，困在井里的矿工由下而上，打通了井道，40几人全部获救，无一人死亡。当刘仁听到这一消息后，当即昏倒在电话机旁。当他醒来的时候，他的亲人递给他一面镜子：“瞧，你的头发一夜之间白了多少！”

身体稍一康复，刘仁立即下到矿区，了解矿工生活及他们的要求。当听说白酒供应不足时，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矿工长年在井下作业，很容易得关节炎，白酒可以去风湿的，就是王府井少卖一点白酒，也要先给矿工喝。”

1964年，毛泽东视察南方回京，在丰台车站他乘坐的列车上，接见了刘仁。毛泽东说：“以前，有人说了你们一些闲话，现在看来，说得不对。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

是的，北京的发展有目共睹，1965年，其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提高35倍，平均每年递增25%。一个新兴的工业基地崛起了！

还得从“地下”做文章

1956年夏，京西连降暴雨，永定河陡涨。

一串电话铃声把刘仁从梦中惊醒。有人报告说，永定河水将在一河中小岛上劳动的20余名社员团团围住，汹涌的洪水截断了他们的后路，情况十分危急。

水火无情！刘仁当机立断。

是夜，驻京空军、海军和工程兵接到命令：做好准备，随时出动展开营救。

第二天上午，空军派出直升飞机观察水情，并给社员抛下干粮和慰问信。随后，海军的一支小舢舨驶到岛边，20余名社员从屋顶上爬上舢舨，安全地到达河堤。当他们走下舢舨时，刘仁快步走过去，握着他们的手，连声说：“受惊了！”

20几个社员热泪盈眶，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

看着这些得救的农民，刘仁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天有不测风云。刘仁十分关注旱涝与自然灾害的影响。他常在睡梦中被雷声惊醒，朦胧中拿起电话问值班电话员：“雨下了多少？下透了没有？有没有淹没庄稼？”

日久天长，电话员每遇风、雹、雨、雪天气，就马上同有关部门联系，先主动了解情况，以备刘仁询问。

“要治水……”刘仁默默念叨。此时，中央也下了决心，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密云水库的建设工作。刘仁对周总理说：“总理，我是革命军中的马前卒，这次水库施工，北京市委决定由我指挥各项准备、设计工作，我一定做好您的助手。”

周恩来看着这位质朴而充满革命热情的老战士，握住他的手，点了点头说：“刘仁同志，让我们齐心协力，圆满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1959年白河大坝施工度汛前，设计人员提出加固廊道，并挖开已建的走马庄副坝来限制库水位上升，刘仁果断地支持了这一方案，白河大坝顺利度汛，为水库全面建成奠定了基础。

水库淹没了大量农田，数以万计的农民从库区迁移并被妥善安置。市委在施工期间调集几万民工，日以继夜地战斗在工地，还负责供应20万民工的生活用品。

在刘仁的主持下，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密云水库顺利建成。

一次，刘仁在清华大学水利系与师生座谈三家店及张坊水库的设计、永定河和拒马河下游的防洪和北京市工农业用水问题。

一名年长的教师说：“三家店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令人十分头痛，另外，张坊水库的地基漏水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刘仁点了点头说：“我看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水土保持问题，泥沙淤积我们可以想办法排沙嘛！关于张坊水库，我认为广大师生应弄清隔水岩层的分布和溶洞的规律。办法也是有的嘛！”

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连连称是，又疑惑地问：“刘书记，您解放前学的是水利工程吧！”

刘仁哈哈一笑，回答说：“差不多，我们的共同任务之一是研究如何从‘地下’做文章。”

那个同学似懂非懂。刘仁拍了拍他的肩膀开玩笑似地说：“我是北京的‘管家’，当然什么都得懂一点啰。”

他有一个外号：“留人”

1949年春夏之交，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一次招待会，特邀各大学教授、知名学者参加。

席间，周总理拉着刘仁的手，向大家介绍说：“这个同志可不简单啦！想必诸位大都认识他。解放前夕，他喜欢到你们那里串门，把你们都留下了，一个也不肯给蒋介石，难怪有人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留人’，把在座各位都给留住啦！”

正是在中共地下党的努力争取之下，解放前夕，北平各大学的教授、讲师，除少数几个早在几个月之前随胡宗南出走外，其余全部留了下来。尽管有人为许多教授送来飞机票，但是谁也不肯走。

北京高校保留了一大批知识分子。

解放后，刘仁仍一直关注党的教育事业，关注知识分子的成长。

清华有一位教授，当时担任学校的行政领导工作。他有一个学生是国民党特务，潜入我根据地后被逮捕。由于这位教授不了解那个学生的底细，还误认为这个人是爱国青年，因此对党产生了误解。刘仁知道此事后，曾几次专门和清华大学校党委的同志谈话，要他们做好教授的思想工作。他说：“这位教授我是知道的，他一向爱国，你们要设法消除他对党的误解，要注意方法。”

不久，这位教授心中的疙瘩解开了。他曾专门打电话给刘仁，“刘书记，感谢你对敝人的信任，我也相信你们共产党人。”

刘仁会心地笑了。

1958年后，北大化学系和兄弟单位合作，决心人工合成胰岛

素。刘仁大力支持了这一科研攻关项目，他有时到学校，不是先进党委办公楼，而是直接到实验室去。

三年困难时期，北大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人力大减，有陷入停顿的危险。

刘仁找到当时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对他深情地说：“老陆，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个项目全世界都在搞，我国搞得最好，眼看着就要成功了。它的成功，必将大大振奋广大科技工作者的革命热情。”

陆平回答说：“国外也有搞这项研究的，但搞得不理想，不知道我们的水平到底怎样？”

刘仁没有立即回答。他踱来踱去，空气有些沉闷，陆平有点沉不住气了。他试探性地问：“党委的意思是……”

“上。”刘仁挥了挥手，“外国人做得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外国人做不到的，我们也应该能做到。”

1965年，中国人在世界上首次合成人工胰岛素，轰动了全世界。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50年代末，5月下旬的一天，风和日丽，晴空万里。

刘仁只身前往北京农业大学试验站的麦田里进行实地调查。

他叫住一位名叫梁国柱的青年学生，问：“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是学农学的。”

“那你说说看，这亩小麦地最多能打多少斤粮食啊？”

梁国柱不加思索地回答：“很可能亩产1万斤吧！”

这样的回答今天听起来似乎有些可笑，但在那个“卫星”满天飞的年代，却是极时髦的。有人也许想笑，但却不敢，或者不屑。

“那好，”刘仁笑着说：“再过10年你要能亩产1万斤，我就奖给你一个博士。”

小梁不以为然。

他不悦地说：“报上都这么说的，再过 10 年也许要亩产 10 万斤了。《人民日报》告诉我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难道不是吗？”

恰好一位姓李的老教授走了过来，听到小梁的这番话后，十分生气。他自言自语似地说：“亩产 10 万斤，你以为是在做梦啊？乱弹琴！青年人不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将来是要吃亏的。”

刘仁微笑着跟老教授打了声招呼。他知道小梁心里还是有些不服。他问小梁：“你们的试验田产量怎么样？”

这个问题简单明了。小梁怔怔地发愣，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上。他呐呐地说：“才 1 千多斤，是我们种得不好吧？”

刘仁摘下草帽，他看到小梁头上在冒汗，给他扇了扇，语重心长地说：“不是种得不好，而是种得不如你想象的那样好。亩产 1 万斤，那麦秆非得粗得像杨树杆，否则怎能挂得住那么重的穗？”他用指头轻轻地点了点小梁的头，“嗯，凡事要开动脑筋，以后可不许再受骗啰！”

小梁羞愧地低下头，随后像突然明白过来似的，感激地说：“您今天给我上的一课，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一次，北京市团委发现一个工厂的青工用小段自来水管做了超声波喷头，用材不多，用途却不小。大家都很兴奋，未经市委及团中央批准，即向全市 1 百万团员、青年发出号召，要求每个人都制作这样一个超声波喷头。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工厂里许多崭新的水管被锯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浪费极大。

团干部们都很紧张，心想这回可捅了个大娄子。不料，刘仁却首先肯定他们的热情。他招呼大家坐下来，给他们倒上开水，亲切地说：“不要拘束，今天我们开个交心会，交流交流工作的得失成败。你们最近的工作有起色，调动了广大青年的积极性，这是要肯定的啰！”

一名团干部不好意思地说：“我们现在做的喷头，几乎可以说是人手一个，差不多可以用上10年、8年的。”

刘仁拍了拍他的脑袋，问大家：“你们考虑过没有，每人做一个喷头，要用多少管材？一下子做1百万个又干什么用？这样做会真正调动广大青年的创造性吗？”

刘仁看到大家都默不作声，想活跃一下气氛，诙谐地说：“你们都做了喷头吧？别扔了，我用得着。我那口子在家里种了好些蔬菜、花草什么的，有机会到我家看看怎么利用这些喷头。”

大家哈哈一笑，但人人都记住了这次教训。

梦想并不奢侈

1957年春，一个外国足球队来访，同我国国家足球队在先农坛举行友谊比赛。

由于场上出现队员的纠纷，赛后数千观众包围客队，情况十分混乱。

刘仁当时正在市委开会，闻讯后马上指派一个负责同志指挥有关人员采取有力措施，劝导观众离开现场。

这件事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已是当天深夜1点多钟。周恩来把刘仁和几个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找到中南海去。他表扬了刘仁亲自处理这一事件，严肃批评另一些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他强调：我们应坚决反对大国主义，反对锦标主义。

体育是一面镜子，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

10几年来，刘仁几乎走遍了北京市所有的运动场、训练馆、运动员宿舍和食堂。

他有一个梦想，其实这梦想并不奢侈：国际赛场上，中华健儿争先，五星红旗一次次升起，《义勇军进行曲》久久回荡。

1958年，北京第一次搞城市规划，刘仁建议分地区建立大中型综合性体育赛场和群众活动场所；各居民区按人口比例建立小

型体育场和健身房；中小学校建设都要有适当规模的体育场地。

1959年和1961年，北京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工人体育场和工人体育馆。

在北京先农坛体育训练基地初建时，需要一个工厂和一个学校搬迁，刘仁直接请市委有关负责人到现场，当场研究解决办法。

工厂和学校搬迁过程中产生一系列难题：停工、停课、资金短缺……负责处理此事的同志一时犯难，拿不定主意。

电话直接打到了刘仁的办公室。

“搬！”刘仁斩钉截铁地说了一个字。施工顺利进行，现代化的训练基地建成了。

刘仁经常去训练基地，同广大教练员、运动员交流思想，解决他们遇到的各种难题。他说：“我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很高，体育运动水平要搞上去，要相符合。北京是我国的首都，不要满足于在国内比赛中拿个第一、第二，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有些年轻运动员抱怨，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太少。

刘仁耐心地听取了大家的意见，针对这一问题，他解释说：“目前我国经济还很困难，不可能经常派运动员参加各类国际大赛。同时，我是这样看的，我们要练好基本功，宁可少参加正式比赛，也要保证比赛水平。”

“东亚病夫”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刘仁非常欣慰。从训练基地走出了一批又一批全国冠军、亚洲冠军、世界冠军，他的心血没有白费。

“两把刀”、“八根绳”，

蹬着三轮钱难挣

解放前，北京的回民区流传着一句俗语：“两把刀”、“八根绳”，蹬着三轮钱难挣。很形象地描绘了回民艰难贫困的生活。

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回民是一个民族，只把他们当成特殊的国